

# The Core Value of H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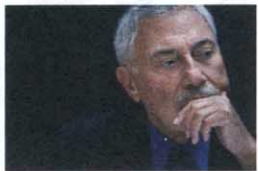
## 香港核心价值

都说香港是国际都市，要体现这份精神，种族的多元化，思维上的开放包容，机会的平等，与国际接轨的健全法制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谈论香港核心价值，我们邀来了几位一早已定居香港的外国人。他们虽然是outsider，但同时亦是insider——在芸芸的国际城市中，他们选择了香港，并落地生根，以此为家。

香港以一个小城而可以跻身国际舞台，闪亮如东方之珠，历史的因缘际会之外，若果没有香港人那份自强的努力，又如何令得夹在中西之间、不中不英的她打造出传奇的故事？然而，这个香港传奇里有的不止是本地人，还有这些深谙香港核心价值并且珍而重之的老外。



陆恭蕙



Henry Steiner



Thomas D. Gorman



Peter Cookson Smith



Paul Zimmerman

主持：

C：陆恭蕙

现为香港独立非牟利公共政策智囊组织思汇政策研究所行政总监，亦是研究所的其中一位创办人。未涉足政坛前曾在商界工作14年。1992年被委任为立法局议员，其后分别参加1995年及1998年之立法局/会直选，并成功连任。2000年决定不再参选，成立思汇政策研究所，常就经济、政治及企业社会责任等范畴广泛撰文，文章曾刊登于本地及海外杂志或学术期刊。

出席嘉宾：

H：Henry Steiner 石汉瑞

生于奥地利，五岁定居纽约，并在当地完成教育，在耶鲁大学师从当代设计大师Paul Rand，1961年前来香港，在全亚洲发行的《Asia magazine》担任美术设计。两年后正式开始自己的设计专业，位于香港中环的希尔顿酒店（于九十年代初拆卸，现址为长江集团中心）是他第一个客户，后来的客户则包括了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香港赛马会、太古集团、连卡佛百货、渣打银行等等。作品多年来在本地及太平洋区获奖无数，他亦是香港设计师协会的创办人之一，人称其为“香港设计之父”。人们往往以跨文化cross culture来形容石汉瑞的设计，其擅长将东西方的文化元素混合成自己的风格，亦可说是香港精神的反映。一切都建基于他对香港本地华人社会的深刻体会。

T：Thomas D. Gorman 高德思

生于美国芝加哥，中学时开始学习汉语。1974年开始定居香港，之后亦经常前往中国内地旅行，于1995年时担任香港美国商会主席，现任Fortune China《财富中国》杂志主席及总编辑。在他的个人博客里，他以四不像作为笔名，以中英双语撰写他历年来在香港及内地生活的有趣经历。  
<http://app.fortunechina.com/weblog/?uid=16>

Pe：Peter Cookson Smith 施倍德

生于英国，1976年起定居香港，本身是建筑师及城市规划师，其所创立的Urbis Limited是香港最资深的城市、环境及地景规划公司之一，早年从事不少香港新界新市镇的发展项目。身兼香港大学建筑系荣誉教授的他，深入研究香港的街道生活，并出版了《街道与空间——变奏中的香港城市设计》(The Urban Design of Impermanence)一书，以详细的街头写真去记录香港历年来的不断发展，种种街道生活的景象或已消失流逝，却烙印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

Pa：Paul Zimmerman 司马文

1958年于荷兰出生，1984年移居香港。期间管理超过15间旅游代办处，其中10间位于中国。本身亦是SIPA“国际航空协会预订旅行社商会”行政委员会会员，以及“China International Travel Management Alliance”（组织致力于中国推广国际商务旅游管理代理）的组织创办人。近年积极参与“创建香港”DesigningHK组织，致力于香港城市及海港规划，并担任“可持续旅游联盟”召集人，促进香港的生态旅游发展。

“孩子在香港成长的美妙之处是，他们长大了就是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s）。”

C：你们在香港多久了？加起来一定是一个可观的数目。

T：我是35年。

H：49年。

Pe：33年。

Pa：25年，我是“最小”的呢！

C：加起来一共是142年，真是令人惊叹。你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做了父亲，所以我们可以从父亲、家庭的角度讲起，而不只是在香港生意人的身份。你们可以随时来、随时走，但为什么在香港生活了这么多年并且现在还在这里？你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T：其实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属于这一类：最初不过打算在这里工作一两年，但自然而然就留在香港并成家立业。我爱这个地方。虽然有不少地方还可以改善，但我仍然觉得香港是一个了不起的城市，很自由。

我来自芝加哥。有两个理由让我选择前来香港，其一是新闻媒体；其二是中国。念书时我已开始研究中国，学习过中文。在这方面，没有一个地方比香港更适合了，我甚至从没认真想过要离开，这里就像是我的家，我还建立了一个家庭。香港也是一个很适合去建立一个“全球化大家庭”（global family）的地方，这是她的力量之一。虽然她有本身的难题，但也有很多选择，只要看看孩子们的教育机会之多便可见一斑。我估计，现时香港有多达46间国际学校——这已经很寻常——还未算上本地的学校。孩子在香港成长的美妙之处是，他们长大了就是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s），邻居和同学来自包括香港在内的世界各地。

早在九七主权移交之前，香港对我来说已是见证和参与中国转型蜕变的一个理想据点。回归前有人预期上海将会取代香港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但今日看来，这预测距离事实仍然很远，两个城市其实都有很多生存空间，而彼此亦很不相同。无论是回归前后，香港持之以恒的力量乃是资讯可以自由流通。它的重要性并不纯粹对于市场运作而言，更在于人本

身的思维方式，以及社会上的沟通。无论是对于中国或世界其他城市而言，我始终深信这是香港最大的长处之一。

C：Henry，那你来自什么地方？

H：我的祖先来自西班牙，大约五百年前离开那里，因为当时的选择是改信天主教、死于火刑或者离开。于是我们迁徙到奥地利。我在维也纳出世，六十年前再移居纽约，然后来到香港。和Tom的情况一样，我在香港得到一份工作。1961年时，我在纽约效力的杂志刚刚创办了名为《Asia magazine》的杂志，那是一本以亚洲为基地的周刊。本来只打算来九个月，延期至两年……之后因为干得不错而获得继续聘用，便留下来了。

我有两个儿子，都在香港出世，在英基学校上学。较小的儿子是一名招聘顾问，他不喜欢我称他为猎头族（Headhunter）。前阵子他曾回来香港数星期——他喜欢回香港。他的同学虽然分布在上海、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地，但也经常回来，香港对他们有种吸引力。

我们喜欢吃点心。在西营盘有一家新开业的中式茶楼叫莲香居，我们去过几次，那是一个朴实无华、喧闹又混乱的地方。身处其中，作为唯一“鬼佬”的感觉十分有趣。我们又去了大屿山的梅窝，与住在那里的一个鬼佬朋友吃了一顿中国菜。儿子又建议到动植物公园去（编注：位于中区雅宾利道，香港最早期的公园），这是个很神奇的地方，但我已很久没有到那里去了。儿子想看看那些“大猫”（编按：豹）还在不在。当然都不在了，现在只有大乌龟什么的。他对那个地方有一份特别的情愫。我觉得香港是个世界城，比起本地人我的孩子并没有觉得自己不是香港人。有趣的是他倒没有在意兰桂坊花太多时间。

“只要来过香港一次，当你再来时，感觉就像穿上一双旧拖鞋般惬意，她是一个很容易让人融入的地方。”

C：Peter又如何呢？

Pe：我来自伦敦，1976年来港。我和别人一样也是为了工作，来的时候没想着“我要在此度过余生”。在港六个月后，我在伦敦工作了数年的顾问公司没有兴趣在香港继续发展，于是我另起炉灶，在这里成立了自己的

公司。当时的英国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国家，政治很糟糕，人们经常示威，整个伦敦都因为煤矿工人罢工而停电，只能每周工作三天。香港却是一个充满生气、活力和机会的地方，吸引力可想而知。

我本身是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这亦是令我留在香港的原因——当时过半数的香港人口都集中在市区，他们大部份居住在天台、山边或者避风塘那些简陋的居所里。我来港时正值各种房屋计划、新市镇计划的展开。我最初的工作是建立大埔新市镇，那时资源很少，人手匮乏，只有一两个人的小组，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根本没可能发生，但这里的人却很愿意为年轻但有经验的人提供机会。那时候我们都有清晰的目标，政府亦知道怎样做适当的决策。在十年间于各区打造的多个新市镇，便是通过良好的管治才能建成的（编注：除大埔外，还包括沙田、屯门等等）。我们跟本地人一起工作的问题不大，人们对工作的热忱和专业性亦举目皆是。香港是一个跟我过去所认知的地方差异很大的社会。我经常跟人说，只要来过香港一次，当你再来时，感觉就像穿上一双旧拖鞋般惬意，她是一个很容易让人融入的地方。

尤其在语言方面。在座各位可能没有为政府工作过，但是以前有许多许多外国人在香港政府工作，他们只懂些基础的粤语。即使我的工作要每天和华人社会接触，我很多朋友也是华人，但是我从来没有学习过粤语。我并不是说这是一件好事，但这是香港的一个优势：你不懂这里的语言也可以融入工作环境之中。当然这其中历史因素，我们都受到英国长期管治的影响。

C：Paul又怎样呢？

Pa：我来自荷兰鹿特丹。小时候父亲经常前去中国买卖纺织品。每次当他外游回来，家里总会播放三分钟短片，最初是8厘米，然后是超8。作为家中长子，我负责将爸爸的影片剪辑并配上标题，播放出来。这是我认识亚洲的契机。

大学毕业后，我不想留在荷兰工作，反而来到亚洲。当时我获得一家荷兰银行聘用，留港工作三个月，很快我就知道自己不是银行家的料，但决定要留下来。那时候的香港是24/7（编注：是一天24小时，一星期7天的缩写，即全天候提供服务的意思。），我开玩

笑说，每星期二晚我离家上班，回家时已经是星期日的早上。作为一个刚离开学校的年轻人，这地方是极度刺激的。其时正值1984年，香港刚走出危机，处处都是工作机会。我得以发展自己的事业，和公司一起成长。

我在这里学会了很多东西：例如骑电单车——因为我负担不起计程车费，但又极讨厌每天上班时要乘地铁。我还学会风帆、潜水和滑翔伞等等，所有运动和爬山我都有兴趣。而在香港最好的一点是，无论去哪里，车程都不过15分钟。我们抬头看看天空里云层的漂移，以某种速度朝着某个方向，你就知道这天气可以飞，45分钟后你就可以找到绝好的位置，开始在香港上空滑翔。世界上再没有其他这样的城市了，你可以在近距离内做各种各样的活动。

我有两个孩子，分别是14和16岁（还有一个即将出生），刚前去英国继续学业，拓宽国际视野。在1997至98年时，我以一个蛮不错的价钱卖掉生意后，打算离开香港。我的确离开过，先是去了荷兰，虽然找到不俗的工作，但发现在那里的生活超闷；然后我去了澳大利亚，那里很漂亮但同样极为沉闷。尔后我为菲律宾做一个专案，他们赞助了当时有机会进入世界杯决赛周的中国足球队，于是我去了上海半年，她跟1984至85年时的香港很相像，一切都是24/7。但每逢周末当我想带孩子出门活动时，两小时过去了，你会发现你仍然被困在市中心内。这件事让我放弃了在中国生活。

当我回到香港时，偶然地听说本地有一个103岁的荷兰人刚过世。其时我在荷兰的母亲因为关节受到感染不良于行，甚至连离家都很担忧。她查询过所有为老病而设的房屋设施，结果却令她很担心，也因为这样令我决定留在香港——在这里我可以找到很专业的护理。同时我亦开始从事本地社区工作，认识了一群关注保育的年轻人，重新建立自己和这地方的关系。我的朋友都在这里，又开始介入香港的本地生活，还有山，有海，再没有离开的原因了。

“就是那份密集及多元化，令机会变得唾手可得。”

C：香港拥有什么特质让你没有沉闷的感觉？为什么其他地方，例如荷兰，又会让人

感觉沉闷？

Pa：就是那份密集及多元化，令机会变得唾手可得。在荷兰你无论到哪里都需要不少时间。当你比较自己在两个地方可以做些什么时，便会发现在香港可以随时改变原定计划，然后眼前会有很多全新的机会，在我的经历中有这种特质的城市寥寥无几。

Pe：为什么香港既刺激又趣味盎然？很简单，我觉得她是一个小巧紧密而且管理完善的都市，让你在短短的时间里可以做很多事情。在伦敦的话，外出开一个会议，便是一整天时间，当中有四小时花在乘火车上。在这里，你一天之中大可以处理八、九甚至十件事情，甚至可以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午餐。如此一来便令生活变得很有意思，那种多元化及生气勃勃，以及一份can do精神，贯穿在生意及其他方面。

“因为可以做很多事情，结果让你有雄心壮志去做更多，这也是另一种动力。”

C：我倒想谈谈有关弹性的问题。香港人懂得随机应变，一天内可以跟八个人或团体会面，不少外国人对此都感到惊讶。香港人接触外人也很开放，这是很独特的。只要摇一摇电话说“我是某某，可以见见面吗？”命中率是很高的。为什么会是如此？

Pe：因为这大有可能是赚钱的好机会呀！

Pa：这亦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

Pe：九七年前，当我们和政府合作，碰到有问题要解决时，除港督以外，只消打一个电话便可以找到几乎所有人。我曾不只一次直接打电话给布政司署负责的官员，他们都乐意立即接见并解决问题。这在今天变成很难。政府转变了，变得缺乏反应，我想这影响了我们推进及办妥事情的能力。很多政府高级官员花费了大量时间撰写立法会文件。

H：他们虽仍然是干公务civil，却肯定不再是仆人servant。（编注：公务员英文是civil servant，直译是公仆）

C：那民间又如何？上星期我带一位来自美国的女士拜访一些香港商界的重要人物，她事后告诉我，这些人都彬彬有礼，出门时会送

客，确认我们知道怎么走回去。她感到很诧异。民间的情况会否跟政府不一样？

Pe：民间还是可以的。在办公室内，我会确保每个致电来的人在当天都会得到接待。更经常有学生在午餐时候到访我的办公室——在香港，这样的做法很普遍，因为人们都愿意腾出时间。如果时间许可，我们甚至可以在中午十二时碰面半个小时什么的。

C：他们只来半个小时？

Pe：对。这跟西方、英国很不同。每次去到英国时，我总是很奇怪，那些人会留下一个口讯或者电邮，约你在一个多月之后共晋晚餐。如果你想约人，对方总是回答，“本周不可以，下周看来有点忙，或者两周后吧！但等等，那时候我好像要出门……”总之废话连篇。其实我只想说，“我就在外边，可以碰面五分钟吗！”

Pa：这里大家都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机会亦很容易失去。如果可以把事情当下便处理好，何必要把它塞进满满的日志之内？人人都追求效率。

C：这肯定是香港的核心价值之一了。你们会怎样解释它？

H：我想那是由饥饿引申出来的一种动力——你要肯定自己下一顿饭由哪里来。但对我来说，香港另一个往往为人所忽视的核心价值是：人们好像与生俱来的有礼貌。他们经常把：“很抱歉，你可以再说一次吗？”和“唔该”(please)挂在嘴边。而且他们会排队……我经常乘搭电车，人很多，挤沙丁鱼似杂技表演，但上车下车却不会推撞争先，人们都习之为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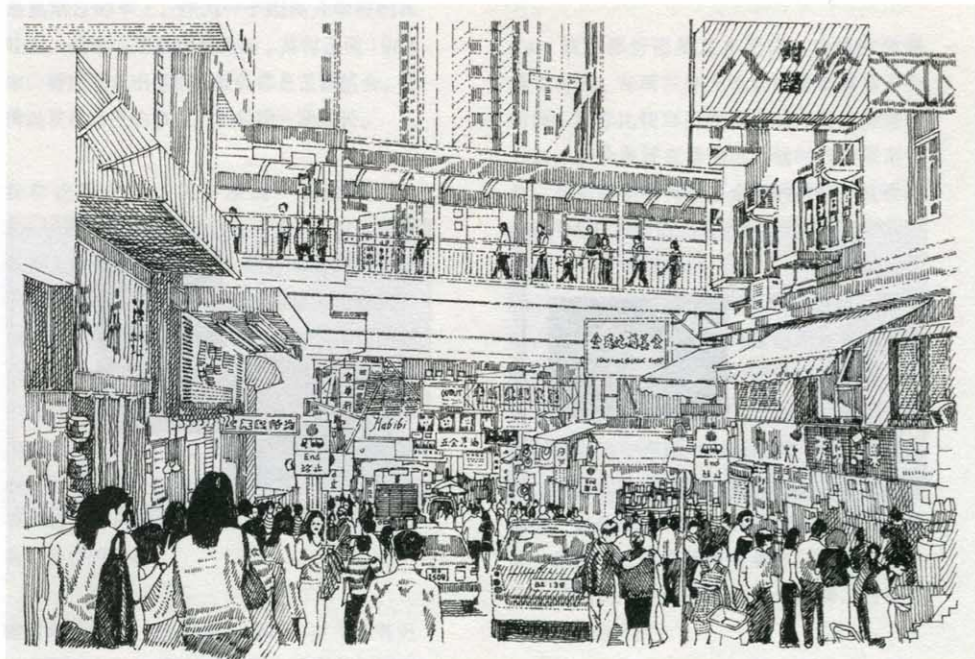
T：香港虽然成功，但人们却没有因而变得骄傲。这亦是他们有礼、开明的原因。不像某些美国人一般。同样重要的是人们依旧非常勤劳。在纽约或者伦敦，若你想要在星期日下午开会，除非是早已认识的朋友，大部分人都不会答应，他们根本不在乎。

“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迷思，以为在大陆做生意较香港便宜。”

C：人们喜欢快速行事，从而又引起更多的



Henry Steiner曾自资出版了一本小书：《Foolish Things》，纪录他最爱的香港事物。



01



02

01-02 Peter Cookson Smith 曾出版《街道与空间——变奏中的香港城市设计》一书，以钜细无遗的笔触纪录了他最爱的香港街道生活。01为中环街道；02为深水埗。

抱负和目标——因为可以做到，所以想做更多。香港的核心价值和香港人的行为表现很有关系。

Pa: 在荷兰有些贵价名车你永远不能开，因为会招人异议。在澳大利亚可能更是如此。但在这里人们会说：“哇，太棒了。明天我也这样。”

H: 就我所理解，澳洲有不少人患上长栗症候群（tall poppy syndrome）。那些冒出头来的要要都会被砍掉。

Pa: 香港人不会嫉妒你，而是想“酷！我也有机会这样。”

H: 在中国，要到邓小平南巡，并说每个人都可以富起来之后，财富才不是罪过。

C: 那是一种积极正面的态度？

Pe: 而且人们不会觉得自己没有机会。但这好像正在改变中。

C: 真的吗？比起25年前，机会真的比从前少了？

T: 我想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迷思，以为在内地做生意什么都较香港便宜。无疑在制造业，江苏和江西等地的生产成本确实比香港便宜，然而就服务业来说，若拿上海北京与香港比较，只要认真计算成本、生产效率、劳动成本、以及种种隐藏的税项等，便

会发现香港仍然很有竞争力，甚至比五年前更甚。因此，我觉得香港机会还多的是。

Pa: 但香港市场的成长真的不如从前了，尤其比较1984至97年间。那时候新加入市场的人数之不尽，而有开创精神的企业家总是机会无穷，人人都有机会证明自己的实力。但今天市场是扁平的，对新加入者来说便很困难。当下好些内地投资者或者公司在香港经营，令香港人觉得市场被他们偷走了，因为对方生产成本便宜，可以以更低廉的价格竞争。更甚者是眼看内地人来港买房，他们的孩子占去本地的教育及医疗的空间。当下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冲突，部分人甚至感觉被入侵了。

“不少专业性的服务行业都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如何从下一个梯队中觅得人材去巩固公司的基础。”

Pe: 我想大家都察觉到香港在变，其一是很难找到怀着热情并愿意花时间留在专业里打拼的年轻人。他们宁可选择政府、公营部门或大企业，很少愿意加入小规模私人公司。

C: 你是指建筑师？

Pe: 我是指普遍的服务性行业。不少专业性的服务行业都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如何从下一个梯队中觅得人材去巩固公司的基础。某程度上我们正在丧失那份开创的优势。我们比过往几年更强调香港要成为中国的服务中

心 service centre，无论是做生意的，还是提供服务的，人人都回内地工作。虽然我们很想招聘内地人，但现实上很困难。然而从本港大学聘来的年轻一辈却又不愿意长时间留下来；最大的讽刺是，我们现在聘请愈来愈多海外来的人，从澳大利亚、英国或者其他来本地寻找工作机会的人。

C: 就像35年前的你？

Pe: 嗯，有一点相近。从前我们在报上刊登招聘广告，大抵会得到一百个申请，但现在却困难得多了，我也不明所以。在香港的教育系统内，学生的首选是医科，其次是法律，建筑只是第四或第五个选择，这是人所皆知的事。人们追求安全感，当然也有些人认为去中国内地机会更多，也有来自家长的压力。

H: 我妈妈曾希望我当一个医生。或者老师，最起码可以有充裕的假期，总之不可以做艺术家。会饿肚子。

C: 过去二十年香港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很清楚我们之中有些是较年长，我们和年轻人的联系足够吗？我们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吗？他们又怎么看这些年香港的优缺点？

Pe: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却很难一概而论。例如环境问题，我们和青年人的确欠缺沟通。年轻人某程度上感到很挫败，这种情绪亦扩展到其他方面。就最近的高速铁路事件而言，重点便是背后潜藏的挫败感。他们

01 70年代的港岛电车路。（图片提供：高德思）

02 高德思来港后，于70年代曾居于长洲。（图片提供：高德思）



01



02

的意见没有被聆听。当下我们好像钻进了牛角尖里，有人会说，从前殖民管治的土地和金融体制，限制了城市建设以及我们市区的更新能力。但现时的政府各部门只关心自己的日程；缺乏整体蓝图，也不知如何达到目标。我并不想这样批评，但每次当我因为种种合作工程而要前往政府部门开会时，却发现会议桌旁边起码有两打以上的人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告诉你，他们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没有人例外。每次离开，总是令人万分气馁。例如我们的维港四周其实可以有很多发展机会，却总缺乏高瞻远瞩，反而把精力消耗在自己一手制造的问题中畏缩不前。

C：跟民间正好相反？

Pe：正是如此。政府的问题是没有人愿意负责任，人人拒绝去做决定。无疑，我们是活在一个儒家的社会里，事事要讲中庸、要有规有矩，没有人愿意拍柏树敌，这是中国人社会吸引人的地方，但当中亦不乏挫败感。

H：香港是广东一部分，一直以来都很国际化。在Canton变成Guangzhou之前，是交通运输和贸易的同义词，而香港一直保留着这份感觉。她亦是那些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聚居的华侨的首府。但我们现在的讨论有点像为香港旅游发展局宣传似的。对于香港当下的走向，我委实有些保留。

行政长官说政府的目标之一是要支持本地制造业，对于一个政府来说，这是很奇怪的讲法。有一句谚语：You don't have a cat to watch a fish（不应让猫儿帮你看管鱼），但这却是政府的现状。政府政策由大地产商去主理；立法会内离奇地存在一些并没有发挥实际功能的所谓“功能组别”；但另一方面，真正管理这个城市的“决策者”却是一群本来只擅长执行决策的公务员。他们是公务员而不是政治家或领袖，没有能力作出明智的决策。我不想再谈论迪士尼、数码港，以及在添马舰海傍不断举办的奇妙的都会博览会了。

“我们已到了一个尴尬的状况——拿着石头砸自己的脚。”

C：当我们谈到香港人的基因是效率和动力时，面对政府缺乏弹性、花上大量时间却议而不决，会不会意味着，这正违背了我们本身的核心价值，违反了香港人的一贯手法？

Pe：正是如此。当那些政策制订者和局长等等齐齐站起来说香港将会拥有全世界最好的海岸时，那景况真的很奇怪。因为人人都知道如果按照我们现时的做事方式，没有可能会成功。并非因为没有懂得去做的人材，而是我们的机制让事情往相反方向走。那些政府官员又认定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毫无弹性地严格执行这些程序指引。

我们已到了一个尴尬的状况——拿着石头砸自己的脚，就像要求最好的跑手争夺金牌，却在比赛前将他一双脚都绑起一样。我曾经跟政府内部的人谈过，但他们却说：“我们当然做得对——我们谘询过公众，这将会是世界上最好的海岸。”事实上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包括专业团体、关心公众事务的组织等，借着写信、参加会议、研讨会和种种商谈等等一次又一次表达我们的看法，结果还是什么也没有改变——我们一定要想出办法，跨越这些不知从何而来的障碍。

H：以前，政府主要是要把事情做好，水荒我们就兴建水塘。但当下政府所关心的，只是不去犯错。每次我听到有关公众谘询的倡议时，我就想，要了解人们的意愿，最好的方法便是投票。那是最直接的做法。在英国统治时，港督被委派来处理工作，但今天不同了，由于行政长官不是直接选举出来的，他只想不去犯错。

C：香港正在经历一个很有趣的阶段，回归之后，我们究竟是谁？或者可能是谁？这中间产生了融化和或者模糊化的效应。面对庞大的中国大陆，我们可否集中过去十二年的经验，看它如何影响你对香港的感觉？

T：讲个简单的例子。我和朋友在香港逛商店购物，在高档商店中我们觉得就像是二等公民。所有的服务员都忙着照顾内地顾客。

C：从前则是外国人或者日本人……

T：每个月我都要到北京，我也发现在赤鱘角机场内那些为内地人服务的柜台，五年前大部分都是些身穿古怪西装的中年男子，成群结队的参加旅行团；但现在却有很多穿着休闲、拖着行李独自旅行的年轻夫妇，变化真的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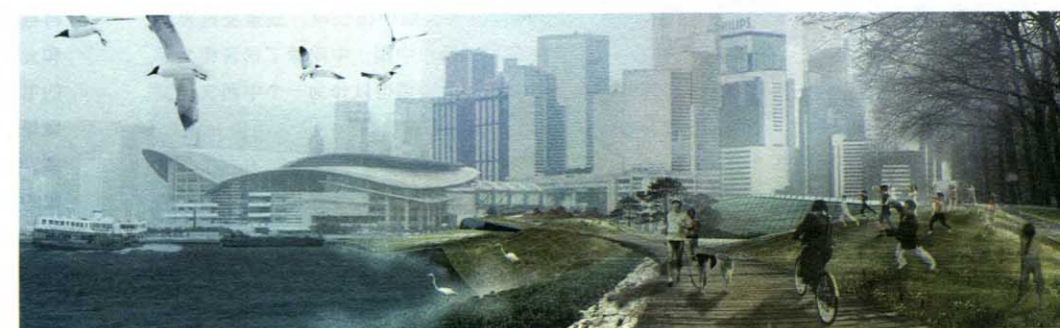
Pa：我对香港发生的一切很乐观。因为不同的原因，政府未能及时追上外间急速的转

变。回想九七之前，为了取得外国护照，很多孩子的父母都在外国；但现在不少人都回到香港来，例如住在我同村的邻居，便刚由纽约回来，他本身是银行家，怀着另一种态度回港发展。我想最大的转折发生在2003年。非典之前，人们还会在街上吐痰；这情况现在已甚为罕见了。这正显示出人们对待环境的态度及期望在转变。而在2006年时，星期六我们还在办公，中午到铺记午餐，下午四时还有工作。但现在在星期五便完成工作，在星期天与家人一起购物之前，你还有一整天时间可以做些不一样的消闲的事，不一定只埋首工作。而香港的人口亦日渐老化，每四个人里便有一个超过65岁。这些都是很大的转变。那些跟我一起站在立法会门外示威的孩子们很投入，并非因为他们快要失业或者那高铁就在他家门外经过，而是因为他们觉得政府的决定是错的。看着他们，令我忆起自己在荷兰念中学时参与过的示威活动。

“很多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香港人都进入内地做事情。他们对内地认知在不断累积。”

Pe：这让我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当我们在谈论香港何去何从的同时，中国内地也在以另一种速度发展。不少同僚或者友人都表示，他们在中国可以做一些在香港没有机会做的事。他们看到内地有更好的环境、动力和资金，当然也看到当地的生活水准。例如住宅空间方面，中国内地明显要比香港优胜得多。反过来看香港，我们却好像已到了顶，以居住单位的空间来说，三十年来都没改变。那时候我们规划大埔，每家住宅都以50平方米为基数；但去年的数字却显示，私人住房的平均面积只有47.5平方米。我曾经在电台谈到关于新界的策略性发展问题，除了可以建多少幢摩天大楼，可不可以亦顾及整体性的编排？

C：香港人一直与中国紧密接触，很多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香港人都进入内地做事情。他们对内地认知的累积。那是一种很实际的而非学院式的知识。以银行界为例，像李国宝这种一流的银行家，自1979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至今，他为了在国内开拓业务，结果累积了对中国金融业丰富的经验和知识，这是十分宝贵的。如果把你我、以及众多的香港人加起来，有哪一个地方可以累积这么多有关中国大陆的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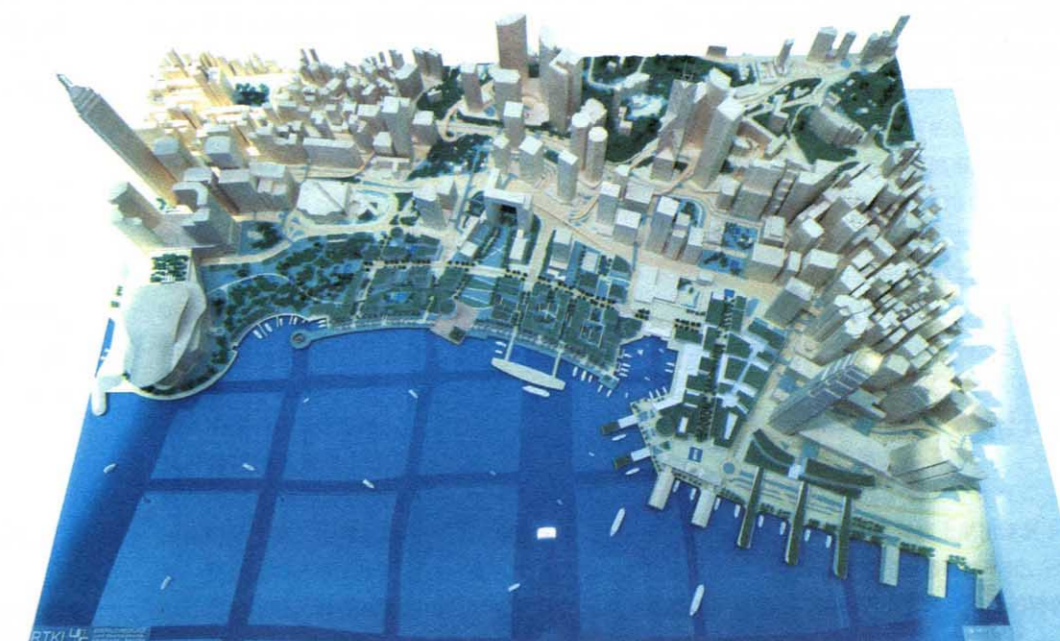


01



02

01-03 司马文有份主持的Designing HK近年积极为改善香港生活环境提出种种建议，图为早前举行的中区维港设计比赛部分得奖作品。（图片提供：Designing HK）



03

T: 这渗透到每个角落和缝隙去, 不单是专业界别, 也见诸于制造业、物流和供应链之上。比起强于食物加工和IT的台湾, 香港有某些部分还是比较优胜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则是中国那份外向性, 中国很多大公司都渴望走向世界。除了上市集资, 香港仍然有很多未被发掘的机会。虽然香港有本身的问题, 但内地也同样面对更大的难题, 例如他们更缺乏拥有国际经验和文化敏感度的人。

C: 在这方面, 香港仍然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T: 这是肯定的。

H: 一如我以前说过, 香港唯一的出路乃是成为中国的服务中心, 其他的制造业或什么六大支柱, 都是浪费时间。我们应该集中于提供服务之上: 医疗、法律、通讯、设计, 建筑, 银行, 会计等等, 都是我们一直在做而且也做得好好的。其他的, 例如工厂就让中国去做好了(虽然很多工厂的老板都是香港人)。在沟通上, 我们毫无问题; 银行也有一切标准, 所以内地公司会前来香港上市。我们愈早抓紧香港的独特性, 便愈早清晰方向。我想之所以会产生混乱, 大抵跟那些认为香港应该怎样子的所谓image-maker(形象设计师)有关。

“香港的太太们会去深圳卖那些冒牌货, 内地的女士却来香港买真货, 因为她们信任香港。”

C: 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公司, 或者反过来将外面公司介绍给中国, 中间除了语言作为手段, 你们认为香港可以作为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点而争取到一席位吗?

T: 语言只是其中一环。更重要是明白双方的社会文化、公司文化、它们怎样做决定、决策过程是怎样的, 以及在那个变幻无常的世界里怎样前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 要进入中国大陆, 不单要知道怎样行走, 更需要一套策略性的方法。

Pe: 一方面熟悉大陆, 另一方面又熟悉国际的金融及法制架构, 令很多交易得以在香港成功进行, 也诱使更多资金在香港流动。

H: 人所共知, 香港的太太们会去深圳卖那些冒牌货, 或者跳舞和按摩。反过来, 内地的女士却来香港买真货, 因为她们信任香港。如果买的是黄金, 你会肯定那是真金。若要你买的是瑞士朱古力, 那个真是瑞士来的。大家公认香港是可以信赖的。

C: 可靠的。

H: 还有专业的。

T: 这里有问责制。

H: 另一点也很有趣的是, 香港已经是第三年举办国际古书节。可能有人会感觉很奇怪: 为什么要在香港呢? 但事实上古书节办

得很成功。最大的顾客都是来自内地的机关和大学, 他们到此购买那些在1967年消失了的书籍。香港就是有这个本事, 在中国的背境里, 做一些其他内地城市不容易办得到的事。我所指的是行为举止, 以及一些需要代代累积的理解和体悟, 这些都并非可以在一夜之间便能成就的。你可以买车、买名牌奢侈品, 但你的行为举止, 所为与所不为的, 都需要时间累积。我希望香港可以保持这种经年累月而来的特质。

“如果我要做生意, 要承担责任, 那我定会以香港为基地, 不用冒风险。”

C: 香港是个让你感到安全的地方。你有担心过去某些区域吗?。

Pa: 对的。我的孩子即使只是十一二岁, 但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完全没有令我担心。

C: 我们也不是没有罪案的。那安全感是来自哪里?

Pa: 但罪案不会犯到你的头上。黑社会成员即使在旁边, 也与我们无关。

H: 夜间在街上行走时, 那些穿制服的警察也不会对你作出无缘无故的干涉。

Pe: 这点很有意思。我们的纪律人员令人敬佩, 例如警察、消防、海关, 他们对本地的

办事效率和治安都贡献不少。

T: 现时仍有不少香港人被关在内地的监狱里。他们当中有的干了坏事, 但亦有的是因为牵涉到商业纠纷。当这些事情发生时, 每次回到香港, 便让我感觉很安全。

Pe: 虽然很多金融公司将总部搬到上海去, 但到了某一个阶段他们却都退回了一步; 虽然保持运作, 但谁都不想在当地担任签约的负责人。大家都想以香港为基地。如果我要做生意, 要承担责任, 那我定会以香港为基地, 不用冒风险。在这方面, 香港还是很有优势的。

C: 即使怎样不快和失望, 香港人都会将之转化成破坏性的举动?

H: 人们尊重他人的财产。即使是那些涂鸦, 寻根究底都可能只是些曾经到过外国的香港小孩, 为了表示自己很酷或者是一些鬼佬孩子而已, 而不像西方城市那些俨如瘟疫一样蔓延开去的涂鸦。同样地, 当中也有香港人独有的实际考虑, 为什么要去买一罐喷漆让其他人得益?

“当下的香港由李小龙变得愈来愈像成龙。”

Pa: 25年前我来到香港时, 什么都不认识, 每天下班回家, 换上短裤, 便出门在城市四处漫步。在两个月内, 基本上把整个港岛和九龙都走遍了。在油麻地庙街走走逛逛, 吃



点东西, 也甚是惬意。现在我仍然四处散步, 却发现这个城市可以步行的地方正遭受到极大的破坏, 散步的乐趣也在极速地消失。

H: 我的办公室就位于半山干德道。多年来, 眼看着旁边的建筑物愈来愈高, 车愈来愈多, 但原来的单行路仍然是老样子。

C: 特别狭窄。

H: 分别只是现在中间髹上白线。

C: 密度却比从前提升十倍。

H: 对, 但你可以说什么呢? 根本没有人尝试做些什么去配合实际的使用率。

Pe: 这引伸出另一个问题——当你到达机场, 海关服务很有效率, 八达通又方便, 人们更难以想像, 凭着一张身份证你便可以进出香港(编注: 香港居民出入境时使用电子指纹识别系统, 无需海关人员一一审查证件)。但这只是铜币的一面。为什么我们的城市环境不可以好看一点? 也许我们的行政长官从来都不会四处走动, 但只要走一走, 便随时都可以发现令人生厌的东西: 那些栏杆, 街道的铺砌方式等等都令人震惊, 真的像仍处于第三世界。从前我们在新市镇工作, 每个星期一早上十时左右, 便会接到工程经理的电话,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港督麦理浩早上九时便会打电话给他们——麦理浩本身热爱行山, 他会带着望远镜在八仙岭眺望新市镇, 每逢见到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便给他

们打电话。这种亲力亲为实在是一件很好的事, 现在却不会再有了。我们尝试在制度里工作, 这制度反过来却把我们淹没了。

明日风尚: 香港的一大特点是多样化。例如种族的多样化,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周末来自菲律宾、印尼等地的家庭佣人在香港各处聚会。宗教信仰也是多种多样, 同时有各种庙宇、教堂、清真寺。70年代, 如果周末想离开市区, 只要搭乘1小时的渡轮就可以到长洲等完全不同感觉的地方, 钓鱼或是出海。你们觉得香港现在的多样化是否变得少了?

Pe: 当下的情况很吊诡。一方面我觉得这里仍然很多元化。25或30年前, 我们连兰桂坊都没有。当然也没有迪士尼。但现在选择更多了, 何况我们还有很好的郊野公园、离岛渡轮服务等等。但问题是城市规划并没有做好, 很多地方看起来都像屯门一样(编注: 新界一个典型的新市镇), 没有自己的个性。身负重任但闭门造车的市区重建局, 大大地摧毁了香港的街道特色, 以及那些原来趣味盎然的老区。这些地区原来的特色是用途多元化, 充满弹性, 懂得适应经济大环境的转变, 如果你将这些地方消灭, 就等同于将香港的多元化也消磨殆尽。

H: 一个政府如果觉得兴建迪士尼比修复中央警署更重要的话, 他们的心态可想而知。它宁愿选择外来进口的东西, 而摒弃本身的特色。当下的香港由李小龙变得愈来愈像成龙——我们好像已丧失了七八十年代的那种尊严、自信和谦虚。



1995年9月, 陆恭蕙参选香港立法会选举时, 以带点Andy Warhol画作味道的海报作宣传。(图片: The Next Magazine)